



人文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2年10月2日
星期日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徐静



【观史所得】

张大千《重阳登高图》 忆的是山东济南的兄弟

□郑学富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这首《九月九忆山东兄弟》是年仅17岁的王维在长安谋取功名时所写。当时正值重阳佳节，漂泊在外的王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此诗借助登高和插茱萸这两个重阳民俗事象，表达了诗人思亲怀友之情。王维家居蒲州，在华山之东，所以《九月九忆山东兄弟》题中的山东并非现在的山东省。而近现代绘画大师张大千所作的《重阳登高图》，表达的怀念主体却是山东省济南的兄弟。

张大千是全能型画家，集文人画、作家画、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，尤其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，画风工写结合，重彩、水墨融为一体，其中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。《重阳登高图》是他应友人之求于1943年所作，此图构图严谨、气势磅礴，准确描绘了关西崇山峻岭的雄伟壮观和石骨坚凝，表现了画家在重阳佳节登高望远、怀念友人的真挚情感。张大千怀念何人？在画的题识中他作了详细注释：“书来说济南事，苦忆关家兄弟贤，正是鹊华好秋色，明湖听曲更何年？”

题诗中的“关家兄弟”，是指关友声、关际泰兄弟。关友声（1906—1970），山东济南泺口镇人，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、山东画派的创始人之一。他出身于盐商家庭，家境富有，自幼聪颖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上世纪20年代，关友声迁居济南，跟随长兄、济南著名书画家关际泰学画，四处写生，画艺渐精，在山东大学国学系毕业后，又前往北平拜师学习诗词歌赋，其间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于非闇等人，尤其与张大千过往甚密，结为莫逆之交。回济南后，关友声与兄长关际泰共创济南国画学社，收徒讲艺，培育新人，后又创办齐鲁画社，主编艺术刊物。关氏兄弟在济南饮虎池前街（现上新街）建成一座德式二层洋楼，取《诗经》中“鸛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之意，名曰“鸛园”。当时，张大千经常往返于北平、上海两地，每次途经济南，必在鸛园小住。

1935年冬，“张大千、方介堪、于非闇书画篆刻联展”在北平举办。张大千携弟子何海霞于这年深秋前往北平，途经济南住在鸛园一月之久。关氏兄弟陪同大千师徒游遍泉城，大明湖的浩渺烟波、残荷凫雁，鹊山、华不注山的红树芦荻、乡野秋景，令大千先生流连忘返。尤其是济南的佳肴美

酒、曲艺说唱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关氏兄弟与大千先生朝夕相处，谈诗论艺。关友声将家藏的历代名画拿出来让张大千鉴赏，张大千见到喜爱的就伏案临摹，并将随身携带的石涛珍品拿出来给关友声观赏临摹。

《重阳登高图》这幅画的落款为：“癸未重阳，伯璞仁兄书来属画，兼及乱离，济南关友声兄弟同游事，画成拈二十八字求正，大千张爰，时在皋兰客次。”“癸未”为1943年。“伯璞仁兄”，即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徐伯璞（1901—2003），曾多次与关氏兄弟一起陪同大千先生畅游泉城，谈书论画，交流技艺，因此也与大千先生相交甚深。

1941年至1943年，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。1943年8月，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”在兰州首展。在此期间，住在皋兰（兰州市区）的张大千收到徐伯璞的来信，徐在信中回忆了他和关氏兄弟陪同大千先生游济南时的情景，尤其感谢大千先生在书画上的指教，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，情真意切。徐还向张大千求画。是时正值重阳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勾起了大千先生对游历济南的美好回忆和对挚友的深深思念之情，一时心情澎湃、浮想联翩，于是乘兴创作了《重阳登高图》，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登高望远是重阳节习俗之一，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绘画的题材。李白吟诵“昨日登高罢，今朝更举觞”的诗句，石涛多次描绘《重阳登高图》。古人登高是为了登山祈福，望远怀亲，又与阳春三月“踏青”相对应，重九登山是为“辞青”。重阳登高还有益于身心健康，这个时节“清气上扬、浊气下沉”，地势越高清气越聚集，于是“重阳登高畅享清气”便成了民俗事象。张大千的这幅《重阳登高图》奇峰巍峨，重峦叠嶂，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；松柏苍翠，庙宇轩昂；山路蜿蜒曲折，石阶层层叠叠。画家采用高远、深远相结合的章法，用笔古朴豪放，表现了画家气吞山河的胸怀与气度。这也正是张大千艺术成熟期的画风，具有强烈的个性，豪迈奔放、雄浑苍茫。

图中一着长袍者站立于左侧的山头之上，会当凌绝顶，天高气爽，极目远眺，满目红叶秋景，视野开阔，心旷神怡，进入意远神驰的境界。人物虽小，但身姿、神态刻画得生动形象，栩栩如生，将登高望远、怀念亲友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。张大千人物画一向喜欢“高士”题材，多采古装，借人物以抒情怀，实际上是自己形象和心迹的笔墨倾诉。

【民俗志】

古人何时开始偏爱茱萸

□卢恩俊

我的家乡没有茱萸，不过在上小学前我就读着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名句，熟悉了“茱萸”这两个字。后来知道它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，不仅能入药祛病、制酒养身，古人还把它作为祭祀、佩饰、避邪之物，和菊花并举风行于重阳节俗。

今又重阳，望着盛开的菊花，自然也想起茱萸，便在重阳诗词里追寻它的影子。发现唐之前，描写茱萸的诗很少，文献的记载却较早。早在《周礼·内则》中就有“三牲用楸”的记载。周代祭祀之制，是把牛羊猪“三牲”放在祭板上，将煎过的茱萸等八种美果放在祭盘中用于祭祀，可见那时人们就视茱萸为非凡之物了。说起茱萸的药用作用，早在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吴晋本草》等著作中，已有记载和赞美之词。后来东汉“桓景带一家人于九月初九戴茱萸囊、登高山躲过灾难”的故事传开后，这一情节被南朝文学家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记载过，茱萸又被当作辟邪驱鬼魅的护身符，被称为“辟邪翁”，它和“长寿花”的菊，一花一果夺艳于重阳。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，更把茱萸当成犒赏全军的奖品，有诗曰：“天门神武树元勋，九日茱萸饗六军”（储光羲《登戏马台作》）。可见，茱萸在中国民俗中的地位与菊花相比并不逊色。既如此，茱萸在唐之前怎么没能像菊花那样灿烂于诗人的字里行间呢？

疑惑之时，就想起了翻阅余光中先生的文章《茱萸之谜》，见文中有云：“重九二花，菊与茱萸，菊花当然更出风头，因为它和陶渊明渊源颇深，而茱萸，在屈原一斥之后，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。”我想，屈原曾在《离骚》吟唱“椒专佞以慢嫫兮，榘又欲充夫佩帷”的诗句，把榘（茱萸）斥之为恶草，许是与之影响有关吧。而到了唐朝，被屈原斥之为恶草的茱萸陡然变成了芬芳之物。此时的诗人都喜欢用茱萸作诗料，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心境，一首首关于茱萸的好诗目不暇接。张说作《九日进茱萸山诗五首》，其中两首提到茱萸：“刻作茱萸节，情生造化间”“菊酒携山客，萸囊系牧童”。杜甫咏重九的十四首诗中也三次提到茱萸。唐朝诗人中关于茱萸的诗句数不胜数，从诗中也能看出，重阳节插茱萸之风，在唐代民间很普遍。用王维诗中的“遍插茱萸”四字盖之，恰如其分。宋代以后，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减，但从明代申时行《吴山登高》诗中的“九月九日风色嘉，吴山登高胜事夸。郡人齐出唱歌曲，满头都插茱萸花”，以及清代吴伟业的《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赏菊》中的“杭稻将登农夫喜，茱萸遍插故人怜”的诗句来看，茱萸之风

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地区依然盛行。

那么，古诗里说的“遍插茱萸”，是往哪里插呢？那遍插可不是什么地方都插，究竟在何处插？怎么插呢？这在唐诗里看得很清楚。朱放的“哪得更将头上发，学他年少插茱萸”，权德舆的“他时头似雪，还对插茱萸”，耿漳的“九日强游登藻井，发稀那敢插茱萸”等，由此可知唐朝插茱萸是插在头上的，是插在发际之间。发际间哪里呢？再看卢纶的“睥睨三层连步障，茱萸一朵映华簪”。簪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，原来唐人是将茱萸插在发簪上的。白居易在《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》诗中也说：“觥醖艳翻菡萏叶，舞鬟摆落茱萸房。”清学者郑珍注：“谓盘鬟如环”，即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。王昌龄的“茱萸插鬓花宜春”，戴叔伦的“插鬓茱萸来未尽”，李白的“插鬓伤早白”等，都说明茱萸是插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上的。

在唐之前，茱萸作为重阳节特有的辟邪饰物，更多的不是“插”在头上，而是臂缠或是身戴。众所周知，重阳节与茱萸的关系，最早见于《续齐谐记》里记载的一个传说，那个传说里的细节是将装着茱萸的彩色布囊缠在臂上，登高山饮菊酒躲避灾祸。可见茱萸“插”在头上，是后来的事情，至于从何时起，无考，但见晋时周处的《风土记》中有语：“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，辟除恶气而御初寒。”综观古诗可见，“插茱萸”之风唐朝最盛。

茱萸主要分吴茱萸、山茱萸两种，风俗里的茱萸又究竟是哪种呢？这在古诗里同样能找到依据。早有曹植《浮萍篇》：“茱萸自有芳，不若桂与兰”，南朝江总《宛转歌》：“菴施摘心心不尽，茱萸折叶叶更芳”，五代徐铉《茱萸诗》：“芳排红结小，香透夹衣轻”等，这些诗句，均写出了茱萸气味芬芳的特点。吴茱萸果实成熟期散发明显的香气，正符合诗中描述，而山茱萸几乎是无味的。尤其是司空曙在《秋园》诗中的描述：“强向衰丛见芳意，茱萸红实似繁花”，更说明茱萸果实分瓣、熟似花开的又一明显特点，这正像吴茱萸具有果瓣形状，而山茱萸却是单一核果。据诗所见，古人重阳节插的正是诗中所说的有芳香气味的吴茱萸。

沿着茱萸的诗韵节律，步步深入，就嗅到了茱萸的酒香。从宋朝苏舜钦的“欲言无上策，且复醉茱萸”里，可以感受痛饮茱萸酒的醉容；从唐朝白居易的“闲听竹枝曲，浅酌茱萸杯”里，可以分享重阳小酌茱萸酒听竹曲的那份惬意……最后，我的目光惊讶于唐朝张谔《九日宴》的诗句：“归来得问茱萸女，今日登高醉几人？”原来古代的重阳节，是如此醉人的节日呀！

